



张中宇 著

白居易《长恨歌》研究

中华文史新刊

中华书局

ZHONGHUA WENSHI XINKAN

本书是对白居易传世名作《长恨歌》的综合性研究。作者在广泛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细密的分析，提出了《长恨歌》主题的“婉转劝讽”说，并围绕这一论点的确立，解决了与之相关的“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长恨歌》主题与白居易诗歌的归类、《长恨歌》主题与艺术结构之关系、《长恨歌》文本笺证等问题，从而获得了一系列颇具启发性的结论，在《长恨歌》的研究上形成新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居易《长恨歌》研究/张中宇著. -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7 - 101 - 04822 - 6

I. 白… II. 张… III. 唐诗 - 文学研究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9092 号

书名 白居易《长恨歌》研究

丛书名 中华文史新刊

著者 张中宇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格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4822 - 6/I · 659

定价 23.00 元

序

中字“任力耕耨，纵意渔猎”，积年之功，写出一部《白居易〈长恨歌〉研究》，请我作序。我从来不为别人作序，有些踌躇。白居易《长恨歌》我从少年时代就十分着迷，十四五岁就能背诵，所谓“目既往还，心亦吐纳”，不自觉间早有了一层情结。我去过骊山的华清池，有意体验过“春寒”时节的“温泉水滑”；去过兴平的马嵬坡，面对杨贵妃的坟茔，想像过“宛转蛾眉马前死”的场景，还低头寻觅过当时“委地无人收”的“花钿”、“翠翘金雀玉搔头”；我去过懿后的仙游寺，努力想弄明白白居易这个“懿后”是呼吸了仙游寺内外什么样的历史文化气息而创作出《长恨歌》的。当然，我更有许多有关《长恨歌》文本的迷惘与困惑。等我读完这部《白居易〈长恨歌〉研究》全帙，惊诧之余，大觉钦佩，不由打破“不为别人写序”的自律，在乙酉春节写成这篇小序。

《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主要围绕《长恨歌》的“主题”——这一千余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立论，即便是“一篇长恨有风情”的专论，即便是《长恨歌》艺术结构的解析、白居易诗歌归类的考辨，甚至《长恨歌》词的文本笺证，也大都围绕着主题的探索展开。一边诠释甄别旧说，一边娓娓道出新见。对以往的诸家旧说，“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努力做到圆照博观，“平理若衡”；对自己的新见，则无不衔接华实，情理两洽，努力做到析辞必精，述证可信。——全书辨析义理，结言端直，折衷前贤，推陈出新，

显露出精微的学术理性思维和大气的艺术审美感悟。

《研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诠释，简言之就是“动之以情的婉讽”说。作者认为，白居易以唐玄宗、杨贵妃故事的传奇性，极力铺张渲染，着意描绘情爱的真挚、深厚以及马嵬之变的惨烈，进而突出帝、妃感情损失之沉重，以特定背景下的悲情故事婉讽帝王，或者说婉讽政治。婉讽说的核心在于，认为对李、杨深情的渲染描绘有利于突出家、国损失之重，因此对帝王的讽劝（而不是批判）也更为有效。我以为，这个诠释有效突破了长期以来《长恨歌》主题研究中爱情与讽谕两说的尖锐对立，或者说，有效地吸纳并“整合”了多年来《长恨歌》主题研究各说的合理成分，因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及合理性。

作者指出，《长恨歌》铺衍真情，但目的指向不在情爱本身，而意在以帝、妃深情之珍贵，然而无可挽回的逝去为可惜可痛。讽谕说对大肆渲染的李杨情爱视而不见；爱情说则囿于情信辞巧的演绎，忽略甚至忘却了白居易的良苦用心，即讽劝本意。作者提示读者：《长恨歌》的前后两部分是有机统一的，尤其是后半部分“非大团圆悲剧模式”的选择、营造，与前半部分波谲云诡、华靡可讽的情爱渲染，形成明显的呼应关系。《长恨歌》的内容展示与结构安排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生意志的呼唤与艺术精神的阐释勾牵着非常紧密的逻辑联系。

长久以来，《长恨歌》（当然也包括《琵琶行》）打动我的是美赡的形制结构与感伤主义的气调风色。《长恨歌》词的华美高雅，《长恨歌》格调的极品才情，特别是《长恨歌》透露出来的深重的感伤与吁嗟，使我长期以来沉缅其中，流宕忘返。

不过，从“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的审美效应来看，感伤与婉讽在情绪设计上的确是可以统一的。第三章指出，《长恨歌》虽然归入感伤诗，但它要表达政治主题是无需解释的。不只因为

感伤诗中本来就有不少政治性鲜明的诗歌，而且在白居易的分类中，与志在兼济、可称为政治诗的讽谕诗并提、相对，意在独善、可称为“非政治诗”的是闲适诗。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从来没有把讽谕诗与感伤诗并提过。因此，“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既不能作为表达爱情主题的证据，也并不影响它以特殊的方式表达政治主题”。

白居易在他的《策林》“采诗以补察时政”中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歌诗焉。”他还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这正是白居易声乐美感论、诗歌创作论的基调。“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唐元和以后人闻《长恨歌》，亦知开元、天宝之政治得失、天人兴衰之大节矣。白居易《张籍古乐府》有句：“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白居易作《长恨歌》当然含有“讽放佚君”的意思，只不过他笔下的李、杨故事凄丽悱恻、真挚动人，他的“讽”便加上“婉”的温和色调，加了美学的艺术处理，加了“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的微讽大义正凿实在美的艺术成就上。

白居易元和元年创作《长恨歌》这一篇当时的“当代文学”巨制，的确是志存深意的。白居易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目光正放在对“当代”时事的关注上。除了第一句“汉”代替“唐”，混淆汉唐时差，避免直接刺激，第三句“杨家有女初长成”，一笔抹去“寿邸”的记忆阴影——这两件伪装隐婉后，便是率性而唱，任情长歌了。这或许就是白居易要垂范后世的“当代文学创作”的义理教训与审美规范吧！《秦中吟》、《新乐府》“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长恨歌》则是“唯歌天子病，愿得生民知”了。内在的意气与用心是统一的，只是笔意

婉约得多，词色雅丽得多，才情投入得多，不然何以风动天下、九州传唱？

也许正是从《长恨歌》开始，华丽绚烂、婉转多情的尚美风格成了七言歌行的正宗与本色。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七言歌行艺术成就能超过《长恨歌》的几乎没有！明末清初吴伟业作《圆圆曲》，形制格调可以模仿《长恨歌》，但“唯美”有余，“感伤”不足。再往前看，中国叙事长篇拔头筹的东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则又显然是“感伤”有余而“唯美”不足了。后世以李、杨情爱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小说、戏剧、诸宫调如《杨太真外传》、《梧桐雨》、《天宝遗事诸宫调》、《长生殿》等无论在丽辞才情或是感伤主旨上都无法与《长恨歌》相提并论了。《长生殿》称佼佼者，“桃生千岁，莲开十丈”，“殿号长生，境齐蓬阆”的铺写仙气太足，而人情淡薄；“兀的不惨杀人也么哥，兀的不苦杀人也么哥”，“黄泉长恨，听说多酸楚”之类的感叹又不免悲怆有余而婉约不足。——白居易这个高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大才子（陈鸿称他有“出世之才”），自有他的聪慧绝妙，他的进退出处、文笔行藏，包括相应的言论表态，恐怕都是后人极难模仿的，这与《长恨歌》一千余年来几成绝响是内在统一的。

《白居易〈长恨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白居易自述“一篇长恨有风情”本来是爱情说的重要证据，但通过历史地考察“风情”在汉唐时代作为文学批评术语的准确涵义，发现“风情”并非指单纯的男女之情，而是与《诗经》“风诗”密切相关的概念。众所周知，“风诗”本来基本上属于单纯的采集民谣，多为情歌，并没有特定政治目的。但自汉儒以来，“风诗”被严重扭曲，成为寄托隐刺、“婉转以讽”政治诗的经典。白居易以其思想倾向在唐代“扭曲”的语境中述说“一篇长恨有风情”，且与“十首秦吟近正声”相对，其意义甚为清楚。由于有效澄清了相

关问题，为文本的阐释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据。其接受效果的多层次分析也开拓了新的思路，亦更为可信地支持婉讽主题的论证。

这部专著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

其一，以《长恨歌》作为“典型样本”，视野向理论的归纳延伸。例如第二章论及“汉儒解经”，其“隐刺”之说捕风捉影今学术界已持否定态度，《研究》并不否定学术界的定评，不过却注意到汉儒被人忽视的另一面，即对文学发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积极的以及相当消极的：

应该说，汉儒对《诗经》风诗的考证，是文学的政治、社会功用的一次“有效”发掘，它以较为系统的方式，尤其是从文学创作与文本本身而不是从外部（如社会作用），相当程度地确立并巩固了文学的政治、社会功能价值，不只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理论贡献，而且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走向与环境乃至中国文人的命运。从积极方面来看，由于对文学地位的“有效”证明，有利于国家或统治阶级对文学的重视和倡导，唐、宋文学的空前繁荣，其实就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政治、经济、人才等资源向文学倾斜甚至集中有关（宋代相当程度地期望文学成为改变社会积弱积贫的手段，对文学乃至文学家寄予了也许超过其承受能力的厚望）。当然，汉儒的“索隐”、附会本身的非科学性带来的消极影响，从文学在不同时代的过分政治化倾向到清代的文字狱，都可隐约感到。（见 110 页注①）

论及文学与社会政治乃至经济等的关系，《研究》认为，“繁荣的文学及成功的文学家，基本上是以或直接或隐含的方式表现他的社会理想、责任和对现实的某些批判。”白居易《新乐府》、《秦中吟》固然是实行现实批判、表现社会理想的典型文

本,他的《长恨歌》同样以调谐金石、婉约多情的“婉讽”手段介入政治主题。因此,《研究》进一步断言,社会需要文学的积极介入以推动它的稳定、发展与繁荣,社会发展又为文学的活跃与进步提供广阔的空间与基础,为文学的挑战提供题目。文学艺术的大胆介入,并不必然损害其艺术性,因为就宏观而言,艺术性越强、艺术水平越高,介入越有效。被文艺的有效介入激活的社会政治、经济又会反过来推动艺术水准的提升,促进文艺向更高水平与精品化方向发展。

因此中宇有一个判断:“汉唐时代对文学过分政治化的诠释其来有自,实在是基于对政治、社会之与文学密切关系的直觉意识。”他说,这就是它的“历史合理性”。——在我看来,这一判断揭示了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是诗歌传统的真谛,摸到了中国文学与中国文人人生关联的脉搏。中国文学艺术形态众制蜂起,中国审美感兴模式源流间出,这种“直觉意识”应是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可贵经验。这类“样本分析”在《研究》中是随处可见的。文学研究往往容易过分着眼于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定性或定位,《研究》的探索,或许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尝试。

其二是集成性。《研究》第一章以巨大篇幅,分六大类、20余小类疏理《长恨歌》主题及相关研究成果,分类之细,搜罗之全,恐怕是无出其右的。全书引注近500次,涉及文献200余种。何以如此?“后记”说:“我更不敢以他人的成果为已出,所以每有所论,必先述已获之成果,后述可能的进展,此为本书基本体例。”众所周知,经过约1200年,《长恨歌》研究者众,累积日丰,如何站在前人基础上展开新的研究是一个突出问题。如此广泛搜罗、细致疏理,当然是为了尊重前人成果,客观上便形成了溯源条流、汇纳百家的特色,使这部专著相当程度展示了

《长恨歌》研究，尤其是主题研究的完整面貌，实现了站在已有成果之上的向前推进。透过这部著作，可以看清不少争论的来龙去脉。

记得我去寻访仙游寺那日，一路从长安、蓝田、樗县转了许多路才见到庄严巍峨的法王塔。法王塔原是仙游寺的附属建筑，因为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近依原件质材完整迁移至黑水北岸，而计划中的仙游寺重建则尚未开工^①。法王塔边不远搭建了一个临时仙游寺，一二佛像，二三僧人，几星烛香，白居易、陈鸿、王质夫讨论李、杨事件的文学氛围一丝未有，白居易《独宿》诗的遗踪更不可问讯。仙游寺原址因当年水库建造测量地势时留有余地，并未完全沉湖。站在仙游寺外俯瞰仙游寺原址的低矮山包，黑水委婉，波光粼粼。终南山迤逦横绝，白云青靄，秋光浩荡；中峰众壑间，红树点点，林表淡出，颇有点缥缈的感觉。八百里秦川太阳下无边亮丽。地理变迁，山水已改，古韵遥远，心曲难弹。千里寻访之热心，被清碧的黑河水浇凉不少。

听仙游寺的僧人说，从长安来仙游寺，有一条骑马行的山间便道，这就是著名的“终南捷径”了。当年白居易往来长安、鳌屋间，走的便是那条“终南捷径”。

白居易的《长恨歌》创作，从理念到艺术，或许正走了一条“终南捷径”。元和元年，三十五岁的白居易以一篇才情饱满、意绪感伤的《长恨歌》风动天下，从此云蒸泉涌，桂冠闪亮，声名远播东瀛扶桑。白居易晚年“狡兔三窟”，将自己一生文集抄写三部，分别庋藏于庐山东林寺、洛阳圣善寺和苏州南禅院。六十

^① 仙游寺及法王塔因建黑河水库向西安供水拆迁。可参阅附录“仙游寺、楼观及鳌屋的文化环境对《长恨歌》创作的影响”。

九岁时他又自己编写了一部《白氏洛中集》，藏于伊阙的香山寺，隔伊水与龙门石窟烟波相对。揣其意，大抵是担心述载心志的诗文失传而被历史忘却。其实，从《长恨歌》问世那一天起，他便已注定垂芳百世了。精品的流传速于置邮而远播，经典的魅力远胜处心积虑的深藏。

中宇的《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或许也会在中国唐诗研究史上立下一块可观的碑石。结合“后记”中有关“本书基本体例”的陈述，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严谨忠懃的研究态度、沉实审慎的学术风格和简练畅达的文笔特色。我深信，这册《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会得到严肃的学术界的首肯与赞赏。——这是我第一次为别人写序，或许也是最后一次。

胡 明
二〇〇五年二月十五日

目 录

序	胡 明 1
前 言.....	1
第一章 《长恨歌》主题研究概述	9
第一节 爱情主题说	10
一、对李、杨之情评价的变化及爱情主题的提出	10
二、帝王爱情说	11
三、典型(普遍)爱情说	14
四、作者寄托说	17
五、爱情品格说	20
六、爱情说的主要依据	21
七、爱情说的局限	28
第二节 “隐事”说	29
一、流落民间说	29
二、背叛爱情说	31
三、“逃亡”说	34
四、对“隐事说”的反驳	35
五、马嵬之变与杨妃之死考略	37
第三节 讽谕说	40
一、讽谕说的源起及其演进	40
二、暴露与批判说	43

三、惩戒说	46
四、政争说	48
五、解剖制度说	50
六、讽谕说的主要依据	52
七、《长恨歌传》版本考略	57
第四节 感伤说	69
一、时事变迁说	69
二、人生或生命创痛说	70
三、“终极意义”说及其他	72
第五节 双重及多重主题说	74
一、讽谕、爱情兼有说	75
二、矛盾主题说	78
三、形象大于思想说	80
四、正、副主题说及表层、深层主题说	82
五、三重主题说	85
六、双重及多重主题说的其他主要依据	86
第六节 无主题(思想)说与泛主题说	88
一、无主题(思想)说	88
二、泛主题说	89
第二章 “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	93
第一节 关于“风情”的争论与分歧	93
一、“男女恋情”说	94
二、“并举”、“对偶”、“互文”说	96
三、“戏赠”说	98
四、爱情说与讽谕说对“风情”理解的主要差异	98
第二节 “风情”考略	100
一、“风情”与《诗经》风诗的关系	100

二、先秦、两汉、南北朝对风诗看法的演进	101
三、唐代对“风”、“雅”的进一步发挥	104
四、结论	107
第三节 白居易的态度与	
“一篇长恨有风情”之讨论	108
一、唐代环境、文化传统与白居易的文学主张	108
二、白居易对风诗的态度及其与 汉儒“隐刺”说的区别	111
三、白氏述“一篇长恨有风情”的真实内涵	113
四、关于“并举”、“对偶”、“互文”说的辨证	115
第三章 白居易诗歌归类考	118
第一节 关于分类的争论与分歧	119
一、爱情说的看法	119
二、讽谕说的观点	121
第二节 白居易分类的基本依据和方式	122
一、第一次分类：清晰的形式标准	123
二、讽谕、闲适、感伤诗的分类问题	124
三、感伤诗的分类依据	126
四、白居易分类概说	128
第三节 讨论与结论	130
一、白居易对自己诗歌进行的分类图示	130
二、关于《长恨歌》的归类及其与主题的关系	132
三、结论	133
第四章 “动之以情”婉讽主题（上）	134
第一节 李、杨关系的史实与性质	136
一、唐玄宗、杨贵妃关系的历史记载	136
二、对李、杨关系的不同评价	138

三、 现代汉语“爱情”、“情爱”意涵的区别	141
四、 李、杨关系的性质与术语选择的策略	143
第二节 贵妃的宠信与荒废朝政	145
一、“背景”说及相关材料取舍问题	145
二、“从此君王不早朝”与“姊妹弟兄皆列土”	147
三、结论	151
第三节 马嵬惊变	152
一、史料记载的杨贵妃之死	152
二、“贵妃之死”描写的文本及倾向性比较	153
三、结论	160
第四节 玄宗的思念与寻找	161
一、“思念”、“仙寻”情节的“悲苦”内涵	161
二、《长恨歌》的非大团圆悲剧模式	165
三、结论	168
第五节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 无绝期”与结论	169
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 绝期”在结构上的意义	169
二、白居易对帝王作用的评价	172
三、结论	175
第五章 “动之以情”婉讽主题(下)	178
第一节 “动之以情”婉讽主题与讽谕各说的比较	180
一、与暴露、批判说及惩戒说的比较	180
二、与“解剖制度”说的比较	185
三、“讽谕”概念的特殊性及学术选择的偏失	189
第二节 《长恨歌》的接受差异及其 对婉讽主题的证实	191

一、 接受效果整体评价的局限与策略.....	191
二、 《唐宋诗醇》载乾隆帝评价的信度及其价值	193
三、 《全唐诗》收录宣宗诗及《唐语林》相关 故实显示的接受效果.....	194
四、 《长恨歌传》不同版本所反映的封建文人 的理解与评价.....	197
五、“妓女夸曰”等相关评价分析	199
六、 结论.....	202
七、 其他.....	203
第三节 婉讽主题与《长恨歌》的艺术结构	204
一、 对《长恨歌》结构的一般看法与分歧	204
二、 研究《长恨歌》艺术结构的一些尝试	208
三、 婉讽主题与艺术结构的统一性.....	212
第六章 《长恨歌》文本笺证	216
一、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217
二、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224
三、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234
四、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234
五、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236
六、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237
七、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239
八、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241
九、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242
十、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244
十一、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245
十二、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247

附录

1. 仙游寺、楼观及整座的文化环境	
对《长恨歌》创作的影响	267
2. 长恨歌	白居易 278
长恨歌传(通行本)	陈 鸿 280
长恨传(《文苑英华》七九四	
附录“丽情集”中别本)	陈 鸿 283
长恨传(《太平广记》本)	陈 鸿 286
李夫人	白居易 289
3. 白居易与创作有关的主要生平事迹	290
主要征引文献	295
后记	299

前 言

白居易长篇古体诗《长恨歌》研究的焦点在主题。《长恨歌》主题是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参与讨论者之众，论文之多，涉及之广，各种观点驳杂、分歧之大，甚为罕见。

综观《长恨歌》主题讨论，提出的各种观点不下数十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约 20 种，可以分为六类：一、爱情说；二、“隐事”说；三、讽谕说；四、感伤说；五、双重及多重主题说；六、无主题与泛主题说。

从总体上考察，自公元 806 年《长恨歌》出以迄 20 世纪初约 1100 年间，对《长恨歌》的评价主要集中于有无规讽史笔、是否艳体，20 世纪前半叶集中于“索隐”、考证，20 世纪 50 年代及 60 年代初期集中于讽谕说与爱情说的争论，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则在承袭各说的基础上多向延伸，新论迭出。

例如“隐事”说，本起于 20 世纪 20 年代以“索隐”著称的俞平伯，80 年代进一步发挥，以为马嵬事变时，士兵诛杀杨氏权贵，唐玄宗迫于形势，同意赐死杨贵妃。但参与其事的高力士和陈玄礼等都是唐玄宗亲信，时间和驿馆构造都可让他们另找一人代替，杨贵妃在夜间换装逃走，流落民间，可能被劫失身，也可能作了女道士，主持一座庵院。唐时的女道士近于妓女，庵院近于妓院。唐玄宗派使者寻访到杨贵妃后，杨贵妃已不愿回长安，将定情物让使者带回，原因可能是杨贵妃已经对爱情不忠实，自觉无颜面见唐玄宗，也可能是唐玄宗年老失势，杨贵妃看穿了皇